

1977年的高考

程为本

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是1977年,大约11月份或12月份,那些天不是很冷。

我与学校附近的两位同班同学一起走出了校门,向公社走去。我们带着行李,行李主要是被条。带被条参加高考,可能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将被条折叠起来,用一根叫作“社上骨”的细绳子捆绑好,然后捆上一根短扁担,扛在肩上,不重,只是体积有点大。当然扛在肩上也有点不雅,但当时大家都那样。再就是毛巾、牙膏牙刷和一个搪瓷缸子,缸子是用来喝水和吃饭的,还带了一双筷子,这是公社通知时特别讲到的要自备的餐具。这些东西统统装在一个黄背包里。黄背包算得上我的标配,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农民大多是背箩筐、布袋子。我的身份既是一个农民,又是一名教师,合起来叫做“民办教师”。

大约是在考试之前一个月左右才听到消息的,正是学校紧张上课时期。所以不是老师领着我们去县城、去考场,而是公社干部带领的。考试之前第一道手续是填志愿,就在公社里填,其中有一栏“服从分配”是必须填的,不填,就想不到参考。走的那天我不是从家里出发的,更没有父母亲及家人的陪送,甚至父母亲及家人不

清楚我具体哪天到县城里去。

我们一行3人到了公社,再步行35里的山路,到了区公所,在这里等车子去县城。迎接高考的氛围很浓,各种宣传工具以及街头巷尾谈及的都离不开高考话题。在等车的当口,有人提出到母校去一趟,母校就是水吼高中,离区公所大约4、5里路程。我们几人走累了,没有去,有附近的同学去了。他们回来跟我说:校长、老师很客气,很关注,还专门问到了我,说程为本都不来学校走一走?还班长呢。

大家都看着我,我心里乐滋滋的。当然,我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好像这个问题也没怎么往心里去,谁知道谁考上呢?甚至觉得这不是一个考生应该思考的问题,考得上也好,考不上也好,不就是到县城去考一次吗?仅仅是考试而已,根本没把什么前途啊、光彩啊、面子啊,跟“高考”二字粘在一起,所以,谈不上焦虑和紧张。

有更多的同学问我:“是考文科还是理科?”我说理科。又问:“文科不好些吗?”我说:“据说理科录取率比文科高,考走的可能性大一些,所以报了理科。”同学们又说:“你报文科也考得上。”

那时的考生真多,因为高考停

摆了十年,就有十个届级的高中生都来参考。水吼中学是一个新办高中,共有4届高中生来参考。考生多,也是一道风景。没有车辆接送,全都是从住宿地步行至考场。在出入考场的时间段里,街道上挤满了人。街道本来就不宽,越发显得人山人海,那真是叫黑压压的人群,普遍的黑、灰、青色服装,基本没有穿红着绿的。

那年作文题有两道,任选一道。第一道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第二道是《科技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当时我有一个非常奇葩的想法,觉得第一道题应该是文科生作的,我报考的是理科,理科才有科技,应该作第二道题,于是就作了第二道题,还作得很快。

考试的热乎劲很快就过去了,我继续忙着教学,无所谓考取没有考取,也不用估分数,也没人要你估分。只是过新年的那段时间里,询问的人太多太多了,有点招架不住,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人家都是好意,不回答又过意不去,我就天天盼着早点开学教书去。这有点像如今在外打拼的单身青年高兴回家过年却又害怕别人问起婚姻的事是一样一样的。

为什么人们对于高考如此重视

呢?因为那时考上了,就等于有了工作了。上了大学,除了服装是自己置办的,其余吃、住、用的花费都是国家全包了,更不需要缴学费。一毕业,国家就给你安排好了工作,直接去报到上班,而且是“国家干部”身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动。

正月中旬的一天,天气很暖和,有明亮的阳光,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在门外稻场上高门大嗓地喊:“我们大队出状元了。”意思是说我考上了,边喊我的名字,边举着通知书往我家里走。“中状元了,中状元了。”他反复这样说着。当然那是一句抬举人的话,也是高兴的话。随后他说:“好像全水吼区只有你一个人考取了呢。”说完这些,一位公社干部才走进门来,原来他俩是一起来“报喜”的。父母亲分外高兴。山里人老规矩不少,父亲领着我进大堂轩,对着祖宗的牌位磕了头,烧了香火,还留报喜人吃了午饭。

这次高考,我非常幸运,居然考上了本科,当时“南林”是部属重点大学。

我们是77年冬天考试、78年春天上学,称为77级。紧接着78年夏天继续招生,当年秋天上学,称为78级。相隔仅半年,在学校里我们就以第一届、第二届相称。

润城·尚郡
RUNCHENG · SHANGJUN
用心厚铸 传世府邸

低至 **3980** 元/m²

七街旁临街现铺 即买即收租
成熟商圈 超大广场

Tel: **5688222 / 15240060638**

项目地址:安庆市大桥开发区天柱山东路与朝阳路交口